

王富仁

序跋集 [下]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富仁序跋集. 下 / 王富仁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4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823-0

I. 王... II. 王... III. 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241 号

王富仁序跋集 (下)

作 者: 王富仁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责任校对: 廖醒梦

封面设计: 郭 炜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16

印 张: 53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全三册)

ISBN 7-81036-823-0/1·160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4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2232999 传真 / 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3833 传真 / 603-9056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王富仁

序跋集 [下]

汕頭大學出版社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 第二辑 ➤

- | | |
|------------------------------|-------|
| 王富仁序跋集（上）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中）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下） | 王富仁 著 |
| 法律移植与文化冲突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 熊金才 著 |
| 潮州学论集 | 陈景熙 著 |
| 萨本仁史学文集 | 萨本仁 著 |
| 程家明自选集 | 程家明 著 |
| 政策创新与地方社会的科学发展 | 郭剑鸣等著 |
| 编余拾论（上）
——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编余拾论（下）
——编辑学潮学摭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撞击与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史论 | 陈占山 著 |
|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 庄 园 编 |
| 文化的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 庄 园 编 |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他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 目 录 ❖

中国人与犹太人

——《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序 (7)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

——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 (29)

《跋涉的梦游者》序 (62)

李明著《鲁迅自我小说研究》序 (66)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 (71)

王卫平《反思与重构》序 (116)

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谢晓霞《〈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序 (120)

感受力与理解力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序 (126)

《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序 (136)

一个城市贫民作家的精神历程

——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序 (160)

重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晚年的研究

——闫庆生教授《晚年孙犁研究》序 (17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杜运通教授《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序 (183)



《孙振春歌词集》序	(193)
张立国、姚代亮《补遗与沉思——中国报告文学史论》序	(195)
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 ——沈庆利《诱惑于“别一世界”》序	(200)
马丽《诗文探微》序	(211)
“小小说”与“大小说” ——黄荣才《小小说集》序	(219)
《望乡集》自序	(223)





中国人与犹太人^{*}

——《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序

我是一个鲁迅研究者，因研究鲁迅，也就格外关注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把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逐渐兴起的左翼文化思潮推向了极端并造成了中国文化空前的大灾难之后，重新思考“五四”、阐释“五四”就成了中国文化重新复兴的关键，而关注“五四”，是不能不关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的，因而我也常常提到西方文化，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看点西方的书。中国人是轻“民族”重“国家”的，我们所说的“民族”也常常是“国家”的意思，与西方在“种族”意义上建立起的“民族”观念不同。我也并不例外，凡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我是一律当作西方文化作品来读、来接受、来理解的。对于他们的“种族”的归属，我是向不注意、更不注重的。我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但却从来没有把他视为一个犹太人，而是把他视为一个德国人。当牛志强先生把他编写的《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及其《续集》的部分样稿放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我过去所说的西方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人的文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犹太人的文化，不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吗？

^{*} 《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今按原文印行。



我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在中国，研究文学的人对自然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向来是不太注意的，我也并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像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维纳这样一些名字还是有点“如雷贯耳”的。特别是爱因斯坦，即使我这个自然科学盲，也不能不对他怀着敬仰和崇拜之情，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领域，而波及到了整个人类文化。他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并称为改变了现代世界的三个文化名人，并且他们都是犹太人。对于中国人，马克思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中国内地的一种新宗教。在新时期，有些人是把我视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但时至今日，那些视我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倒都“前进”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听到马克思主义就皱眉头的，躲之唯恐不及，而我，却总觉得很难摆脱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常想，到底是哪些人对我这个人一生的思想构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呢？检阅我的一生，我的结论是，除了我的父母之外，鲁迅、马克思、毛泽东、巴尔扎克、陀思陀耶夫斯基这几个人对我的影响都是“致命”的。通过我的父母，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存在以及爱的温暖；通过鲁迅，我建立起了感受、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视角；通过毛泽东，我开始知道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斗争的独特的运作方式；通过巴尔扎克，我获得了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初步印象；通过马克思，我始终能够感觉到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背后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人性危机；通过陀思陀耶夫斯基，我感受到宗教意识的存在以及宗教意识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总之，不论是好是坏，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我是无法否认也不想否认的。我最早读到的是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那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同学家里偶尔读到的，此后我就读了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马恩选集》。我读它时的感想，也正像鲁迅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时的感想一样，感到很新异，它使我开始感觉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存在以及其中的



乐趣。在那时，中学是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政治课讲的是国家的政策方针，像《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第三政变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反杜林论》（恩格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都是我在课外读的，并且读了不是一遍。当时读的还有一些中国人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像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都读过。我从来没有想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想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积极分子，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书我确实是有过浓烈的趣味的。当时哲学界、美学界进行的学术论争，例如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争、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争，关于美的本质的论争以及后来的关于“桌子的哲学”的论争，我几乎都曾密切地关注过。到了大学，才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共产党党史课，但我的政治课的成绩都不算好。资本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出的考试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老师让抄书，半本子书，一个字不拉地抄，后来我抄烦了，索性说了个大概的意思就交了上去，结果别人都得了“优秀”，而我却只得了一个“良好”。哲学课就更惨了。哲学课的老师是很喜欢我的，他知道我读了不少哲学书，但那时我在我们班里惹了一点事，到公布考试成绩之前，我们的哲学课老师来了，对我说，我们系领导说我的政治表现不好，不能给我“优秀”，只能给我“良好”。其实，我对分数向来是不太在意的，“良好”已经很好了，何必要“优秀”呢？老师见我并不在意，也感到很满意，但到了第二天，他又找我来了，说系领导说“良好”也不能给我，只能给我“及格”。



我没有办法，“及格”就“及格”吧！反正还不到留级、开除的格。谁知到了下一个学期的开始，他又来了，说系领导认为又可以给我“良好”了，他已经给我把分数册上的成绩改了过来。由此，我知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没有准头的，但我所失望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直至今日，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几乎是没有任何间隔的同情和关切，那种从这种同情和关切中形成的社会激情和理论激情，都使我感到由衷的敬佩。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但马克思主义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成果之一。圣化它的民族固然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漠视它的民族同样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弗洛伊德，我是从鲁迅作品中知道的，但在文革之前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1978年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我曾着重读过一段有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书，没有很深的理解，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于他的学说，我更是通过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来感受、来理解的，就其整体，与其说我的思想更接近弗洛伊德，不如说更接近容格、弗罗姆和马斯洛，弗罗姆和马斯洛也是犹太人。但弗洛伊德是首先把人类的目光引向了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引向了他所说的“潜意识”的，这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把施蛰存作为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最深的文学作家，但我认为，施蛰存并没有接触到中国人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并没有深入到中国人心灵的阴暗处，倒是鲁迅和张爱玲，更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给文学作家带来的心理挖掘的深刻性。不论别人怎样认为，至少在我的感觉中，在向人的心灵深处的开掘上，直至今日，中国作家还是远远不如西方的那些文学大家的，其中有很多就是犹太裔的作家。卡夫卡、普鲁斯特、茨威格、里尔克、施尼茨勒、帕斯捷尔纳克、贝克特、米勒、贝娄，等等，这些犹太裔的文学作家，对于中国的读者，都不是非常陌生的。我读他们的作品并不很多，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我甚至一篇也没



有读过，但凡是读到的，都曾给予过我以深刻的感动。这是一种关注着人类心灵、关注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感动。在这些作家当中，我接触最早的是茨威格的作品，他为巴尔扎克写的传记，我是在中学时代读的，由于专业的关系，像《梵高传》等更新的传记作品我还没有读过，所以时至今日，茨威格的这部传记仍然是我读过的传记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后来又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选集，至少在我的感受里，他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在人的心灵深处引发一场革命的文学作家之一。里尔克的诗在中国现代诗歌诗上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冯至、九叶集派的诗人，都在里尔克那里获得过诗的灵感。冯至的《十四行集》、《九叶集》派诗人的诗，都是我所喜爱的，但作为“诗人”，他们还是与里尔克不同的。“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在中国作家中，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的，是鲁迅，冯至和九叶集派的诗人在内在的意识中对现实的胜利还是有所期待的，因而他们在精神上也没有始终挺得住。假若诗歌不仅仅取决于诗人的才华，还取决于诗人的灵魂，这就使他们的诗在内质上、在境界上有了与里尔克不同的地方。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但不能不说，要接近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仅仅通过艺术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通过创作家内在灵魂的变化。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热过一阵之后，我们就义无反顾地折回到中国固有的通俗文学作品中来了。武侠小说、武打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皇帝和皇妃的戏说或非戏说、忠臣孝子、鸳鸯蝴蝶又重新占领了我们的文化市场，“民族性”、“民族风格”、“大众文化”为中国文学的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我们还承受不起犹太人的沉重的灵魂。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把中国文革前的文化灾难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结果，实际上，凡是在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人，心里都会明白，真正造成文革前的文化灾难的绝不是任何一种理论



学说，而是我们对政治权力的奴性的屈从。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向我们要求的都是理解而不是盲从，我们盲从的是权力，而不是理论。要理解一种理论，就必须同时理解多种理论，不理解与这种理论相联系的其他各种理论，要理解这一种理论也是不可能的。在 17 年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正是有赖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中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才在中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翻译、介绍和传播。有的是以正面的形式，有的是以反面的形式，但反面的形式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别人不知道，至少在我，是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才知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并且对他们都怀着一种学术的尊敬，其中之一的李嘉图就是犹太人。在哲学上，斯宾诺莎是同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一起而获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评价的，他也是一个犹太裔的哲学家，有赖于此前对他的了解以及他对早期郭沫若的影响，我在文革后正式开始文学研究之后便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的两部著作：《中学政治论》和《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在 17 年，伯恩施坦、考茨基是作为两个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的，但在我的观念里，他们也是一些值得我尊敬的人物。我的这种印象是不难理解的，中国的教授和学者都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学说的，不论说这些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学说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但到底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学说，是他们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一些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批判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并且批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趾高气扬，那么煞有介事，其本身就是非常可笑的，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再说，我们这样一些平常的人，是不会真地憎恶人的缺点和错误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缺点和错误，并且自知比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缺点和错误来得更加不能见人。倒是那些声色俱厉地批判别人的思想学说的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感到有些太可怕，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批到我们头上来。所以，至少在我，对修正主义者也是怀着相当程度的尊敬的，现在才知道，这个首席的修正主义大家伯恩施坦竟也是一个犹太人。修正主义阵



营里的犹太人，还有拉萨尔、托洛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卢卡契这样一些人，托洛斯基因了与鲁迅文学思想的关系，卢卡契因了别人对胡风的批判，在我都不仅仅是从政治教科书和文艺教科书中了解到的，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中国人眼里的“坏人”或“反革命”。托洛斯基的书我至今没有读过，而卢卡契的书我是读过的。他有矛盾，并且是深刻的矛盾，像中国的胡风一样，但这是一个被卷入政治革命漩涡中的思想家的思想矛盾，我认为，连他们的矛盾也带有伟大的性质。鲁迅和周作人都很重视世界语、懂得世界语，因而柴门霍夫的名字也是我所熟悉的。他也是犹太人。

通过鲁迅知道的，除了弗洛伊德、托洛斯基这样一些犹太裔思想家之外，还更早地熟悉了像海涅、勃兰兑斯这样的犹太裔诗人和文学史家。对西方的爱情诗，当代的青年大概是通过英国一些诗人的诗歌进行了解的，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海涅。他的《新诗集》、《诗歌集》里的诗大都是爱情诗，我在中学时曾经读得如醉如痴。假若没有记错的话，这两部诗集是钱春绮先生翻译的，另外我还读过冯至先生翻译的《海涅选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我在高中时只买到了第一卷，现在购全了，但读过的还是那时读过的那一卷，它是我读的第一部关于西方文学史的著作。柏格森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不过读他的作品也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我读过他的两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和《笑》，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是在新时期知道的西方文化名人，不过没有读过他们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卡西尔的《人论》、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都是我最近20年读的学术著作，现在才知道，它们的作者都是犹太家庭出身的。在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马克斯·韦伯，在我的感觉里，似乎他对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影响来得比其他思想家更为切实和更为深刻。但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一代人，他们的影响都是



在文革前读到的社会科学著作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老年时期读的作品总不如青年时期读的作品来得印象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总趋于保守，青年人更趋于先进的原因。此外，像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美国电影表演艺术家霍夫曼，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绘画大师毕加索、列维坦，女革命家卢森堡，实业家摩根、洛克菲勒这些犹太人的名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

犹太人呵，犹太人，假若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可回避地感到了从这样一个民族中爆发出来的强大的创造性力量，那么，在当代世界上，又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回避对这样一个民族的思考呢？这是一个民族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的课题。

二

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对另一个民族的思考，都不可能不是在对本民族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都不能不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犹太民族的思考和认识，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性的。我之感到有感受和认识犹太这个民族的需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样是处在“在危机中崛起”的过程中。我并不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白白度过的，我们也在“在危机中挣扎”，我们也在“在挣扎中发展”，克服危机、重新崛起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人民的共同的愿望和要求。但假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感受和认识犹太民族，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是比我们严重不知多少倍的，而他们在文化上的崛起却又是我们暂时无法望其项背的。像爱因斯坦，像马克思，像弗洛伊德，像这两卷犹太裔文化名人传所收入文化名人，其存在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对犹太民族的自身，同时更在于对现代世界、对人类、对人类的文



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们靠着对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重新塑造了自己民族的形象，并且越来越牢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我们的民族，时至今日，还不得不主要靠着我们老祖宗的文化勉强维持着我们作为一个庞大民族的世界形象，我们还无法仅仅用我们现当代人的努力支撑我们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地位和作用。而假若我们从民族危机的形式上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犹太民族的危机更是来自他们民族的外部，来自别民族对犹太民族的歧视、压制、摧残乃至迫害和杀戮，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当然也有外部的压力，但却更来自我们民族的内部。近现当代中国人的一切可贵的努力几乎都是在我们的民族内部消耗掉的。反对洋务派经济改革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镇压了维新运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瓦解了孙中山为我们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亵渎、消磨了“五四”文化革新精神的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不是没有人为克服中华民族的当代危机做出自己的牺牲，而是这些牺牲都被我们本民族内部的另外一些力量消耗掉了。我们看到，犹太民族创造的文化是有其“剩余价值”的，而我们的现当代文化则几乎是没有“剩余价值”的。不但没有“剩余”给世界，“剩余”给人类，甚至也没有“剩余”给我们后代人。直至现在，我们在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努力中都必须从头做起：搞经济改革的必须重新论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搞政治改革的必须重新论证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搞文化革新的必须重新论证“五四”白话文革新的必要性，重视国民精神发展的必须重新论证鲁迅“立人”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大量的精力乃至整个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些发展的起点上被大量消耗掉的。假若我们也是愿意尽快摆脱危机并在危机中崛起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

当我们把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犹太民族在失去自己的故土、失去自己独立发展空间亦即面临自己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之前，是有自己统一的宗教信